

# 广东红色国库历史回顾与启示

廖乾<sup>1</sup> 吴泱<sup>2</sup> 华佳佳<sup>1</sup>

(1.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 510120;2.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广东 528400)

**内容提要:**国库作为国家的“钱袋子”,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库工作,最早可追溯至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华南解放的基地,在红色国库事业探索、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当革命号角响彻南粤大地,广东红色国库事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孕育,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逐渐成长壮大,期间承担着代理财政收支、发行公债、制定财经制度等重要职责,为支援广东革命战争、发展根据地经济财政、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关键词:**红色国库 广东革命 海陆丰劳动银行 税站 南方人民银行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3)06-0104-09

国家金库(简称国库)是负责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拨付的专门机构。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颁布实施,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法律地位,组织管理国库工作成为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库工作,最早可追溯至革命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数年战争消耗和各方势力的经济封锁,红色政权面临着财政收支失衡、货币市场混乱、货物贸易中断、物资严重短缺、生存压力凸显的困境。红色国库应时而生,承担起代理财政收支、发行公债、制定财经制度等重要任务,积极发挥“钱袋子”支撑“枪杆子”的作用,为红色政权统一财政、稳定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

人民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新中国国库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广东历来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革命战争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书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在红色国库事业探索、建设、发展等方面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然而,当前尚未有文献全面系统探讨广东红色国库的发展历史。为此,本文通过多方搜集、深入挖掘、系统整理红色革命时期广东探索和发展国库职能方面的有关做法及经验,以期锚定红色国库历史在时空上的坐标,进一步丰富全国层面的红色国库历史研究成果,拓展我国红色财政、金融史的研究视野,对我们传承、运用好红色国库历

[收稿日期]2023-02-28

[作者简介]廖乾,硕士,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财税体制、国库管理;吴泱,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财政、国库统计;华佳佳,硕士,经济师,研究方向为财税国际经验、国库管理。

史经验,更好推动新时代国库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味“营养剂”。

## 一、文献综述

### (一)关于红色国库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红色国库的研究集中在中央苏区红色国库和地方红色国库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苏区红色国库。董化杰(2020)回顾了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发轫,总结提炼了在红色国库事业奠基人毛泽民领导下,创立国库运行管理的基本模式、盘活国库运转、建立国库相关制度、探索部门间监督制衡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朱兴龙等(2021)追溯了中央苏区红色国库在瑞金孕育萌芽、在延安发展壮大、在西柏坡完备、在新中国实现转变的历程,系统总结红色国库事业和人民银行经理国库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胡颖和曾姝(2022)全面梳理1931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红色国库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提出红色国库制度在风险防范、部门间制衡等诸多方面体现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应成为当代国库制度的价值追求。二是地方红色国库。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提及了江苏部分地区的红色国库。王峰和王青(2019)阐述了由华中银行代理的苏皖边区金库的历史,以及建立湖上金库<sup>①</sup>的历史,指出苏皖边区金库实行预决算制、按期报解、建立地下通汇线,有效保证军政经费拨付,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庞勇(2022)回顾了江苏盐阜金库的创建,分析了盐阜金库建立国库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国库人才队伍、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国库财产安全的主要做法。

<sup>①</sup>1946年8月,苏皖边区大部分县城被敌军占领,华中七地委金库随地委机关行动,撤至泗县以东的洪泽湖上,为金库资金安全建立湖上金库。

### (二)关于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的研究

由上可见,当前理论界未有文献系统地探讨广东红色国库。鉴于国库是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收纳、支出的专门机构,因此从国库职能入手,可将关于研究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的文献分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三个阶段。一是土地革命时期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财政部、税务总局(1988)指出土地革命时期,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在建立人民税收、保障战时财政支出、统一财政收支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9)指出东江苏维埃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经理科,主管财粮物的保管和收支登记核算。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9)回顾了广东创建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华南抗日纵队及其税站的历史,指出税站除负责征收和保管红色税收外,还将税款供给抗日部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22)分析了华南抗日纵队税站收纳税收的职能,指出税站是抗日纵队赖以生存发展的“钱袋子”。三是解放战争时期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肖茂盛和甘运标(1999)探讨了南方人民银行的历史作用,指出南方人民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代理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收款和拨款,有力保障了华南解放区部队的供给。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等(1991)指出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内设业务部,负责财政收支等事项,并代理发行了胜利公债,这些职能为支援解放大军南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对红色国库的研究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关于红色国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苏区红色国库和少数地方的红色国库,尚未有文献涉及

广东红色国库；二是关于广东红色资金收纳和拨付的研究大多都是围绕革命战争时期广东金融和财政工作展开的，局限于金融史或财政史的研究视角，尚未从国库视角全面、系统地整合广东发展红色国库职能方面的相关经验。有鉴于此，本文立足央行国库视角，深入挖掘广东红色国库事业发展历程，全面梳理广东发展红色国库职能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国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意义。

## 二、广东红色国库的历史脉络

(一)土地革命时期：艰辛探索，广东红色国库在斗争中开始孕育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广东<sup>①</sup>相继发动讨蒋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150多次，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在波及全省的武装起义中，广东各地党的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中共东江特委、广州市委等组织，开辟了东江、琼崖<sup>②</sup>革命根据地。东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较早、范围较大、影响较深的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之一，它以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为起点，从海陆丰的割据扩大至整个东江地区的割据，先后建立了海陆惠紫<sup>③</sup>、潮普惠等9块县级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4月东江大多数地区已建立县区苏维埃，苏区面积超7000平方里，苏区人口超60万。在此基础上，1930年5月，东江苏维埃政

府正式成立。

东江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为土地革命时期广东红色国库事业的孕育提供了依托。早在1928年4月，东江特委就颁发《东江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各科股工作大纲》，在东江各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设经理科，内设粮服股、会计股，其中粮服股主管筹集公粮和物资保管，会计股主管财粮物的收支登记核算，实际履行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支出等部分国库职能，并逐步实行统一的财政收支。同时，东江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大规模围剿的艰苦条件下，在创办苏维埃政权银行、调剂财政资金、强化预决算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土地革命时期，东江苏区有关红色国库的主要做法如下：

### 1.组织收纳财政收入，建立人民政权税收

东江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没收地主、恶霸和反动派的财产收入。这不仅保障了苏区物资的供给，而且还是经济上削弱反动派的必要手段。1928年秋，海陆惠紫根据地的打没收入，除供给党政机关和工农武装经费开支外，还上交东江特委4万元大洋。海陆丰武装暴动后四个月内，仅没收反动派的收入就武装近千人的工农革命军。除了取之于敌的财政收入外，东江苏区还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建立人民自己的税收。1929年10月，《中共东江特委通告〈第十七号〉》指出“取消一切反动政府军阀衙门的捐税，实行总累进税”。东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彻底废除各种苛捐杂税，仅保留烟酒税、屠宰税和盐税等，并实行低税率的农业税，比如海丰的土地税为土地生产收入的10%，丰顺的土地税对贫农免税、一般农民征5%、富农征15%—30%。<sup>④</sup>

### 2.成立苏维埃银行，调剂资金充实预算

1927年，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sup>①</sup>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局。192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中共广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广东区委。1927年4月，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于同年5月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

<sup>②</sup>琼崖革命根据地现位于海南省。

<sup>③</sup>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由早期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

<sup>④</sup>欧大军.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业[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82-88.

建立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收支困境。为此,1928年2月20日海陆丰劳动银行成立,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剂资金,支持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海陆丰劳动银行成立后,暂借南丰织造厂银票2万元,加盖劳动银行印章后发行流通。<sup>①</sup>海陆丰劳动银行的建立和银票的发行,对解决当时苏区财政困难、增加财政收入、支援军需起到了良好作用。2月末,在国民党围攻下海陆丰劳动银行撤销,虽然存续时间短,但它发行的银票仍随着海陆惠紫武装斗争的继续,而在市场中流通,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依然发挥作用。

### 3.保障土地革命战争需要的财政支出

东江苏区建立初期,政权初创,战斗仍频,财政支出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土地革命战争供给,使有限的物资满足战争需要。因此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苏区军队的给养和经费供给。根据1927年11月海陆丰苏区形成时的情况统计,海陆丰财政在11月收入大约八万元,但开销亦在六七万元,支出除维持海陆丰军队伙食等费用外,还须帮助惠阳等县的活动经费与上缴省委的经费。<sup>②</sup>此外,还有苏维埃党政机关运转的办公费、交通费等,如,海陆丰苏区把油、盐等战时储备物资运输到后方基地,就花费了大量车马费和脚力费。

### 4.逐步统一规范财政预算管理

土地革命初期,东江各县区苏维埃的财粮征收、分配和管理经常出现不统一的现象。为了扩大财源、规范财政收支,1928年4月,东江特委要求“财政收入支出应有紧密的预算及决算,财政之分

配应适得其宜”。1928年5月,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信里提出“县级以下政府所有的财政收支,都要归县苏维埃统一管理”。1930年,广东省委要求“统一全省经济,财政统一不但可以挽救党的经济危机,而且可以打破党的涣散状态”。同时,审计制度也初见雏形。1929年12月,广东省委建议东江特委“苏维埃政府对于财政必须精密的监督。如有私人舞弊发生时,应处以最严重的革命纪律”。<sup>③</sup>

(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税站,广东红色国库在职能上逐步专业

1935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和反复“围剿”,东江苏维埃政权遭受破坏,东江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广东人民奋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珠三角等地区组建抗日游击队,此后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抗日武装相继成立,部队总人数近3万人,华南敌后抗日战场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sup>④</sup>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44年,中共中央正式将华南抗日武装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初期,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曾是广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来源。1940年后,由于国民党封锁,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外援基本断绝,军需供给十分困难。为此,华南抗日纵队开始在广东东江、珠江、粤中、潮汕、西江、南路一带建立税站,在解决抗日经费的同时,还扩大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影响。税站建立后,实际承担起红色国库的职能,一方面,税站征收和保管红色税收,成为抗日纵队赖以生存发展的“钱袋子”;另一方面,税站供给党政军开支,东江纵队《关于征收税捐问题的指示》中提到“1943年部队的供给,100%靠税收而来”。<sup>④</sup>

<sup>①</sup>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6-67。

<sup>②</sup>王明前.东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研究[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14。

<sup>③</sup>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指南南、华北、华中三个敌后战场。

<sup>④</sup>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惠阳地区税务局.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34-106。

华南抗日纵队税站的主要做法如下：

### 1. 收纳税收等各类收入，支援抗日战争

华南抗日纵队各税站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收纳各类收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收入主要分为五类。一是工商税。东江一带，主要征收来往香港的进出口货物税<sup>①</sup>；珠江、粤中一带，主要征收进出口货物税、行商税、烟叶税、酒税等；南路一带，主要征收商品过境税<sup>②</sup>、屠宰税等。二是农业税。主要形式为协助政府征收公粮，东江一带，制定了统一的公粮征收条例，按地主、佃农、自耕农、祖尝田<sup>③</sup>四类征收公粮<sup>④</sup>；珠江、粤中、南路一带，各根据地由抗日纵队或地方民主政权自定办法，征收公粮或抗战军粮，税率不一。三是罚没收入。主要来源于收缴日伪和反动军政部门的财物，没收汉奸财产等。1944年，粤中抗日游击队粮税总站没收反动政权的粮食十多万担，对汉奸和反动官吏家属罚款港币7万余元。四是缉私收入。在交通要道设置流动巡回税站进行缉私。1943年，珠江纵队查获资敌钨砂一百余担、食糖和大米六百余担。1944年，东江纵队缉获价值二百万元的资敌钨砂。五是公债收入。1945年，东江纵队在路东解放区发行生产建设公债7000万元。<sup>⑤</sup>

### 2. 实施垂直管理，供给抗日部队经费

华南抗日纵队税站分三级，支队<sup>⑥</sup>设税务总站，

大队设中站，另在若干征收点设分站。税站成为游击队员们向前线输送物资的重要据点，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税站收纳税款后，除留本级部队供给外，均层解上级部队领导机关的军需部门，统一供给所属部队的经费开支和拨发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税站严格执行支出审批制度，军需部门各项开支都有审批制度，大开支如购军需物资等需经部队领导审批，小开支也需审批手续。各部队都要执行预算决算制度，厉行节约，戒除任意支出的现象。

### 3. 颁布税收制度，严格收支流程

华南抗日纵队颁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税收条例》《东江解放区征收税率条例》《征收抗日公粮与田赋暂行条例》等制度，规定税收宗旨和任务，确定税种、税率等，做到税负合理，使税站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同时，严格收支的流程和手续，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征税票证由税站印制，编有号码。各税站报解税款时联同存根联上报，以便查核。每隔两三天，部队便派人来取款，写回收据并盖上私章。税站人员如有贪污受贿上百元以上的，处死刑”。<sup>①</sup>

### 4. 加强人员思想和业务培训

华南抗日纵队各税站是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工作危险性极大。为确保收支任务的完成，一方面，税站高度重视思想建设，诸多税务总站成立党支部，分站设党小组，开展政治课学习和个别谈话，不断深化人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形势的了解。1944年，东江纵队举办财务部轮训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另一方面，税站强化业务知识培训。1944年，珠江纵队五桂山根据地陆续抽调税站在职工作人员，学习基本专业知识。1945年初，东江纵队政治部开办税站在职人员轮训班，学习党的税收政策、征收程序、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财政经济政策。

① 进出口货物税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对出入根据地的货物征收的一种税，具有关税性质。其征税原则是：根据地必需的而敌区缺乏或被严格封锁的货物，免税或低税进口；不是根据地必需的而敌区剩余或向根据地倾销的货物，禁止进口或高税进口。

② 商品过境税是针对在革命根据地中转的商品征收的一种税。

③ 祖尝田即旧时宗族为筹集祭祀祖宗所需费用而留出的公田。

④ 地主按收租额征5%；佃农交租后不足10担的免征，10担以上的征1%；自耕农不足20担的免征，20担以上的征2%，30担以上征3%；祖尝田30担以下的征7%，30-200担和200担以上的，分4级按8%、10%、15%、20%全额累进征收。

⑤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华南抗日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EB/OL]. 广东党史网.

⑥ 华南抗日纵队建立支队编制，各纵队编立若干支队，各支队下辖若干大队。

(三)解放战争时期:与时俱进,广东红色国库走向银行代理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南地区大力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清剿”的斗争,开辟了以广东为中心的粤赣湘边区<sup>①</sup>、闽粤赣边区<sup>②</sup>、粤桂湘边区<sup>③</sup>、粤桂边区及粤中边区<sup>④</sup>等根据地。受历史条件所限,解放战争初期广东各根据地被敌分割的较为分散,因此仍沿用抗日战争期间的税站和财经管理办法。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全国解放前夕,原本归属部队领导的税站陆续转制为归属地方政权领导的税务局或税捐处,专门履行税收职能。

与此同时,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广东各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出建立华南解放

区统一的银行。1949年3月,华南分局向党中央请示筹建,发出《方方、许涤新<sup>⑤</sup>为发行流通券问题向中央请示电》,党中央答复称“你们所提办法亦均妥善”,同意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同年7月,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广东省揭阳河婆镇(今揭西县)正式成立,蔡馥生任总经理,开始发行华南解放区统一的本位货币——南方券。总管理处内设业务部、印务局、发行部、会计处、秘书处5个部门,其中业务部负责财政收支等营业事项(见图1)。南方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履行国库职能,代理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收支和发行公债,保障解放区各部队供给,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时期有关红色国库的主要做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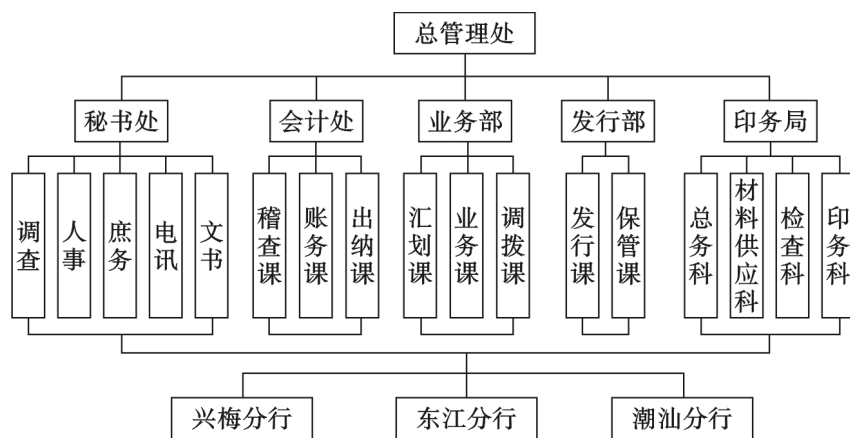


图1 南方人民银行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

### 1.代收财政款项,收纳解放区财政收入

南方人民银行存续期间,共代收华南解放区的

①粤赣湘边区:广东的东江、北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赣南、湘南地区共50余县。

②闽粤赣边区:潮梅和闽西。

③粤桂湘边区:粤汉铁路以西、广东西江以北、广西桂林以东和湖南桂阳以南。

④粤桂边区及粤中边区:湛江为中心的广东南路及桂南、粤中。

⑤方方,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许涤新,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财经委书记。

⑥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金融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303-312。

财政款项8.31亿元。<sup>⑥</sup>除公债收入以外,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工商税。以单一税为原则,主要征收货物进出口税,其他工商税种的征收由各区按具体情形决定,主要包含屠宰税、烟酒税、营业税等。二是财政性货币发行。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初期,财政收入极其有限,而军费、行政事业费大量增加,为解决财政困难,发行了近700万元

财政性南方券。<sup>①</sup>三是农业税。华南解放区制定公粮征收原则规定：“赤贫免收，贫户每年6升，中农1.2斗，富裕中农2.4斗，富农地主执行累进率。如按亩或谷种征收，以占总收获量征3%为原则，依上中下田的平均数确定应征量”<sup>②</sup>。四是其他收入。采取筹措粮款、没收、动员群众献粮献金等举措来增加财政收入。

### 2.代理财政支出,拨付解放区党政军费

南方人民银行存续期间，共拨付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支出款项50.33亿元。华南解放区的财政支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战争军费支出。保证华南革命战争经费和部队给养，是华南解放区财政支出的首要任务。南方人民银行共计拨付边纵各部队军需款29.02亿元，占拨付支出总额的57.7%。二是根据地政府的行政费用。中共华南分局在发行南方券的信中指出：“各地区如因财政困难，应报告区党委，由区党委提出预算，经分局批准，然后交由银行调拨资金补助”。南方人民银行共计拨付地方党政行政经费和支前费用19.46亿元，是华南解放区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sup>③</sup>。

### 3.代理发行胜利公债,负责公债还本付息

1949年8月，南方人民银行受华南解放区东江和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委托，发行胜利公债1000万元以支持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的给养。公债以南方券为本位，票面额分5元、10元、50元、100元、1000元、5000元六种，认购人可缴南方券现款、外币或金银硬币，也可按市价缴付稻谷、棉纱、布匹、生油、片糖五种实物。公债年息6厘，由

南方人民银行负责清还，还本期限为两年。胜利公债可自由买卖，但需要到南方人民银行办理过户手续。<sup>③</sup>

### 4.开展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培养业务骨干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设立南方人民银行后，即开展筹建工作。1949年3月，在香港建中学院开设财政、银行两个业务学习班，学员共65人，于当年6月参加南方人民银行的组建工作。1949年6月，潮汕干部学校开设财经专业班，招收了70余名来自解放区的党政军机关干部学员，专门学习银行业务知识约一个月后，被派到南方人民银行管理处及分支机构主持业务。1950年4月，南方人民银行改制为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基层机构，自此全面结束营业。

## 三、广东红色国库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从1927年广东土地革命拉开序幕到1949年广东全境解放，广东红色国库逐渐成长壮大，积极探索国库支持广东革命战争和服务红色政权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赢得广东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开创性和人民性，是新时代构建现代化国库的宝贵财富。

(一)坚持为民服务,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广东红色国库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收入方面，土地革命初期的国库收入主要是没收收入，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国库转而通过建立人民自己的税收、发行公债、发展根据地经济来获得稳定的收入，并坚持废除苛杂、简化征收、贯彻阶级路线的原则，总税负也轻于未解放地区。例如，中共香港分局在1947年的指示中就曾

<sup>①</sup>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12-28.

<sup>②</sup>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财政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60-175.

<sup>③</sup>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M].广东:广东省怀集人民印刷厂,1991:41-53.

提出：“征粮征税，要比国民政府征收比例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必须保护群众生活所需”<sup>①</sup>，这在本质上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巧取豪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支出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库支出仍尽力支持苏区的经济建设，帮助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扶贫救灾，所以红色国库的公债发行、收纳税收等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年来，随着我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财政收支规模的日益增长，国库收支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国库服务的内容、方式和效率方面，面临来自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因此，必须坚持国库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是及时准确办理预算收支业务，重点保障救灾应急资金、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税退税等民生资金和重点政策落地，确保利民政策落到实处。二是推进城乡国债市场协调发展，持续推动“国债下乡”，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站等方式拓宽国债销售渠道，提高人民群众购债便利性。三是加强国库信息化建设，优化国库会计核算、国债管理、国库现金管理等子系统，增强国库信息系统的延展性和稳定性，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二）坚持依法履职，把握国库监督制衡核心要义

广东红色国库高度重视财经纪律的执行，形成较完备的内控管理制度。华南抗日纵队税站制定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税收条例》、南方人民银行制定的《南方人民银行会计规程》《南方人民

银行总管理处会计、营业、出纳人员职务须知》《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稽核规则》等制度，对会计核算、业务管理等国库工作所涉环节作出了严格规定，包括要求规范会计科目名称和使用范围，统一账簿单据和记账方法，建立严格的账务稽核规则，规范会计人员职权等。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南方人民银行采取了银行代理金库的模式，成为负责财政资金收入、保管、支出的专门机构，通过垂直管理的总分支行模式<sup>②</sup>，实现了国库的相对独立地位，探索了部门间监督制衡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明确了国库监督的主要权限，2015年新《预算法》又对加强预算监督提出系列要求。但是，当前国库监督手段还相对匮乏，国库监管能力建设跟不上业务信息化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加强国库监管：一是健全国库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国库标准化等制度，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缴税退税等制度创新，以制度促规范。二是依法加强对预算收支业务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的监督，运用大数据、业务调研等方式创新非现场监管手段，筑牢国库资金安全屏障。三是推进国库监管数据应用系统建设，更好地适应国库业务电子化趋势，实现对预算收支业务的自动化监督。四是完善国库监督协作机制，强化人民银行、财政、税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推动形成国库业务监管合力。

## （三）坚持人才强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红色国库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重要性突出，加强国库队伍建设便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十分迫切的任务。1944年—1945年，华南抗日纵队税站多次开办在职税站人员轮训班。1949年，南方人民

<sup>①</sup>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财政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60-175。

<sup>②</sup>南方人民银行采取集中管理制,于总行设总管理处,下设潮汕分行、东江分行、兴梅分行3个分行,各城市设支行或办事处。



银行多次开展财政和银行业务学习班,培养了一批具备业务知识的国库干部。除轮训在职干部外,南方人民银行还从党政军机关中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参加银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实践中培养成长。在内控制度中,南方人民银行还要求“银行人员除应具账务知识之外,并应具备各项审计统计之知识,尤须研究新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对银行有关之各种问题有正确之认识而谋各种业务之推进与改善”。<sup>①</sup>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和广东省分行建立,南方人民银行归入各地人民银行,部分南方人民银行干部成为了各地人民银行的业务骨干。

当前,国库部门已发展成为集会计核算、国债发行兑付、现金管理、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等多种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业务部门,这对国库队伍建设和国库人员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部分基层国库人员配备还相对不足,知识结构更新慢,难以满足新时代履职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注重国库各类人员的培养:一是抓好国库队伍建设,重视国库在职人员成长,通过举办理论业务培训、交流轮岗、重大任务承担等方式,增强国库人员运用知识推动履职的本领。二是加强年轻干部引进,不断充实新鲜血液,运用各种“传帮带”机制完善国库人才梯队建设,锻造一批政治上过硬、本领上过人、廉洁上过关的国库干部队伍。三是发挥国库文化的导向作用,营造争先创优氛围,激励国库干部在推动国库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 参考文献:

[1] 董化杰.红色国库的历史钩沉与时代启迪[J].青海金融

(增刊),2020(1):5-9.

- [2] 朱兴龙,葛龙,刘雨川.红色国库的“前世今生”[J].中国金融,2021(16):97-98.
- [3] 胡颖,曾姝.从历史性到创造性:中央苏区红色国库制度及其历史地位研究[J].金融会计,2022(10):67-73.
- [4] 王峰,王青.苏皖边区政府的红色金库[J].中国金融家,2019(12):128-129.
- [5] 庞勇,胥玉娥,王峰.铁军基因铸就的红色国库:盐阜金库[J].金融纵横,2022(4):38-42.
- [6] 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东江革命根据地部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2-14.
- [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财政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60-175.
- [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华南抗日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EB/OL].广东党史网.
- [9] 肖茂盛,甘运标.南方人民银行及南方券的历史作用[J].华南金融研究,1999(2):62-65.
- [10] 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M].广东:广东省怀集人民印刷厂,1991:41-53.
- [1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3-251.
- [12] 欧大军.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业[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82-88.
- [13]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海陆丰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6-67.
- [14] 王明前.东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研究[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8-14.
- [15] 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惠阳地区税务局.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34-106.
- [16] 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12-28.
- [17]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省省志·金融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303-312.
- [18] 秦洪芳.解放战争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论析[D].暨南大学,2004:9-12.

【责任编辑 王东伟】

<sup>①</sup>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秘书处.南方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专刊[J].广东钱币通讯,1989(9).